

【区域经济理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科化探索*

——从民族经济学到共同体经济学

李曦辉

摘要:民族经济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其著作中经常提到的概念,民族问题也是革命导师们关心的重要问题,只不过他们关注的民族大多属于民族国家层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从文明社会开始,就一直存在共同体认同,在生产力发育程度较低的时期,人们认同规模较小的血缘共同体;在生产力得到一定发展以后,人们开始认同规模范围相对较大的地缘共同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以后,人们就开始认同规模范围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也就是民族共同体;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人类就将实现大同。民族经济学是诞生于我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发源于20世纪20年代,正式诞生于1979年。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初主要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经过40余年的发展,加之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民族经济学也与时俱进地进入了新范式时代,迫切需要演进成共同体经济学,起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共同体经济学;学科发展;新范式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4)02—0005—13 **收稿日期:**2023—12—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及其国际比较研究”(19ZDA173)。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23年10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准研

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民族作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单元的理论范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指导基于民族维度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本文研究共同体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研究经济发展模式对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作用,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起着重要作用。

一、引论

研究人类社会共同体问题,就要从马克思恩格斯

的共同体理论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做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提出中国的理论体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提出,人类的认同是沿着血缘、地缘、文化和社会大同的脉络发展演进,这一进程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影响。如今,西方认同主要体现为民族国家认同,中国则主要是基于文化的共同体认同,我们认同的规模范围明显大于西方的认同。认同要受到经济活动的影响,与此相对应,民族国家为主的认同主要由民族经济学来诠释,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主要由共同体经济学来诠释。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学学科化探索,也将从民族经济学演进到共同体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历史脉络来看,民族问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核心问题,由于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人类解放问题紧密相连,因此,民族问题成了一条暗线始终伴随在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之中”(张晋,2013)。时至今日,民族仍然是现代人类群体分类的重要依据,从民族视角看世界也是我们观察世界的重要维度,人们的经济利益更是主要用民族概念加以分野。列宁曾经指出:“工人没有祖国”,但工人阶级又必须生存在一定的民族国家之中。“工人阶级如果不是‘在民族范围内构成起来’,如果不是‘民族的’……,就不能巩固、成长和形成”(列宁,1988)。说明无产阶级或者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也必然采取民族的形式形成与发展,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发展壮大起来。

按照斯大林(1953)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是私有制社会的产物,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产生,亦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消亡,民族是个历史范畴。革命导师对民族概念的理解具有代表性。恩格斯认为:“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1965)。这个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按照公有制原则结合起来的各个民族的民族特点,由于这种结合必然融合在一

起,从而也就自行消失,正如各种不同的等级差别和阶级差别由于废除了它们的基础——私有制——而消失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1979)。人们的群体认同将超越民族范畴,而发展到一个更加广泛的共同体。就像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为了使各民族相互亲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列宁,1990)。社会主义各民族融为一体的过程,首先起源于经济的相互交往与一体化实践,然后才是民族的趋同化,进而实现民族的彻底融合,形成一个更加广泛的民族共同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1958)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伤心,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旧的民族工业部门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着。它们被新的工业部门排挤掉了,因为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部门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从地球上极其遥远的地区运来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58)。“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能再同已经发展的生产力相适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1958)。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共同体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了,民族的共同体成为了共同体的主要形式。恩格斯(2018)认为:“由于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需要和利益,这些新的需要和利益不仅同旧的氏族制度格格不入,而且还千方百计在破坏它”。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民族逐渐形成并至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氏族组织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区组织,因而才能和国家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部落联盟是“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马克思

和恩格斯,1965),“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1982)。“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恩格斯,2018)。再发展下去,拥有统一文化的各民族就会结成民族共同体,以容纳不断发展的生产力的需要。

二、民族经济学学科来源及其述评

民族经济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必然会使经济收益主要在民族之间分配,然后才会在更大的人类共同体之间分割。在民族经济学产生的早期,有学者认为,民族经济学产生有两个直接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启发。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产生了民族地理学、民族语言学、民族心理学,很自然地就从共同的经济生活也就产生了民族经济学(施正一,1987)。二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社会经济,不仅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当中具有特殊性,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属于一个全新的课题。研究这门科学的理论,就是民族经济学(贾晔,1992)。留法民族学家杨堃(1985)提出了学科新来源,“我所说的民族经济学,也叫做经济人类学”。沿此思路有学者认为:“鉴于民族经济学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民族的发展问题,同时也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当前可重点借鉴西方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人类学(也称‘经济民族学’)”(翁乾麟,1987)。

1. 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释

学科建立初期中央民族大学黄万纶用政治经济学理论诠释民族经济学学科范式,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阐释这一路径研究的开拓之作。20余年以后,同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刘永佶的研究成果也是这一路径的发展之作。黄万纶(1983)认为:“‘少数民族经济’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方式(主要是生产关系),兼及上层建筑。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民族理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揭示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特点、结构和规律性的科学。”“它考察的是社

会现象领域中少数民族经济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和矛盾,它主要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少数民族经济’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它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依据和指导,‘少数民族经济’不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少数民族经济中的具体表现及其作用特点,而且还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中的特有的规律性。”“‘少数民族经济’之所以是经济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学科,这是由其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因为经济学科的各个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或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而少数民族经济这一学科乃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因而它属于经济科学的范围,并具有经济科学的性质。”当然,“我们研究的重点要放在生产关系上。”“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就是指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各种经济成分、各个经济部门、各类企业以及社会再生产各个方面的构成及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和各民族间的经济关系。我国少数民族的这种社会经济关系,也是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该篇论文作为少数民族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维度的开拓性研究成果,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依托,提出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定义、对象、指导理论等一系列学科要件,给出了学科的一种范式,具有一定的价值,但也存在可实施性不强等问题。

2006年,刘永佶在《民族经济学大纲》一书中对民族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刘永佶(2007)认为:“民族经济是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对它的研究,具有明确的主体性,虽然对象是相同的,但不同研究主体的利益和意识的差异,使之在研究中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其集中的观念就是主义,在主义的指导下,研究者依主体的要求形成方法,确定研究主题和内容,其中的集合点和主干概念是范畴,各范畴的内在联系,就是体系。”“我们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这一大派系的成员来研究民族经济学的,为此我们是以各民族具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作为他们的利益和意识的体现者来研究经济的民族性和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经济关系的。”“民族经济学简单说就是以民族经济发展和民族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

但并非对各民族的经济活动进行平面式的描述,否则有多少民族就会有多少民族经济学,研究工作几乎不可能进行。必须找到民族经济中特定的性质、关系和矛盾,而这些性质、关系和矛盾又是政治经济学及其经济科学所未曾涉及或不能系统研究的。”“民族经济学以经济的民族性为前提,以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为对象,就是对这一特定矛盾的专门系统研究,在明确对象的前提下,形成由主体的阶级意识集中体现的主义所指导的研究,也就是统一的对矛盾的实证与抽象、规定范畴和概念,构建体系,从而使民族经济学成为系统科学。”“民族经济学的主义,以明确和实现各民族劳动者主体地位为基点,在这个基点上,要注重各民族的平等和自由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经济的发展,目的在为劳动者的自由发展,也就是劳动者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创造必要条件,同时使劳动者可以更为充分地发挥素质技能,二者又是民族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根本。”有的学者在对刘永佶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进行评论时认为,“政治经济学侧重揭示各民族阶级关系的共性和一般性,而民族经济学则具体分析各民族阶级关系的个性或特殊性”(沈斌华,2007)。刘永佶对黄万纶的开创性观点进行了拓展,但没有对民族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维度研究进行拓展,而且对民族阶级关系的一般与特殊界定变得越来越不好抽象,离经济学范式似乎越来越远。

2.源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民族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关心的重点领域。我国的少数民族,“民主改革以后,这些民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落后的、多样的社会形态成为这些民族进入社会主义的‘脱胎母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极端落后,不仅不符合我国的民族政策,也有违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更不利于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还有损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从理论上探讨如何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就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紧迫任务,民族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沈道权,200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实践更是对民族经济学的发展提出了紧迫的要求。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认为:“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全党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1994)。此时,“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主旋律:我国的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也同样面临着如何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考察社会现象中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也就成为研究者们面临的新课题。这项任务是我国的传统民族学所难以胜任的”(龙远蔚,1998)。此时民族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反映了生产要素国际流动趋势的加速和经济文化联系的日趋增强。‘全球化’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系统综合互动的演进过程,并与‘本土化’交织叠合、共存并进,尤其是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与民族性无法割裂,这就为积极应对提出了要求”(叶坦,2005)。这种新型的全球化,不仅需要民族经济的理论指导,还需要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民族经济学从产生之初就没有形成学术共同体普遍认同的定义与研究对象。学科创始人之一的施正一(1993)认为:“民族经济学的概念内涵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层面来界定。从广义上来说,它可以根据需要研究世界上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经济问题。从狭义上来说,它是研究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在我国则研究除汉族以外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广义、狭义之分为学科进一步发展预留了空间,但也使研究更难聚焦,此外,既研究少数民族又研究民族地区,也让研究工作不好定位。其实,早在1956年,民族学家费孝通、林耀华(1985)就曾撰文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但也有学者不这样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就是中国的民族集团或单个民族的经济问题,不是说该学科就一定是‘中国造’,但起码还不具备触及世界各民族的体系扩张能力”(李忠斌,2004)。

研究对象的范围变化不定,研究内容更是各抒己见,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标准。施正一认为:“民族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民族经济问题的科学。在我国,现阶段主要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问题。它的研究范围是很广泛的,不仅要研究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现实的经济问题,而且也要研究各个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史,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经济思想史,并且还要研究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关系史。民族经济学既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社会中的各种理论问题,又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实际问题和政策问题,既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纵向研究,又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横向研究”(施正一,1983)。研究范围十分宽泛,研究内容纷繁庞杂,试图通过广泛的罗列来框定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内容,避免出现重要的遗漏。由于研究范围与内容写实而不够抽象,难以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稳定的思维逻辑,其后的研究者则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特点来确定研究内容,各种研究缺乏研究内容上的一致性。有学者认为:“这门科学不是研究一般的后进民族的发展问题,也不是研究世界范围的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而是专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中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特别是社会经济现代化问题”(贾晔,1992)。在民族经济学领域比较权威的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导师组集体撰文认为:“民族经济学科以中国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重大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的。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制度、经济管理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的演进、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民族关系、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相互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族现代化的趋势特征、民族利益的实现方式、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民族经济学还将逐步开展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与世界民族经济以及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与世界华人经济的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导师组,1999)。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环境的变化,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内容。“在民族问题上,经济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这些都积淀成为民族经济生活的基本要素——这就是笔者多年来反复重审的‘经济文化一体性’”(叶坦,2005)。这样一种可以天马行空般地界定研究内容与范围,显然是不符合成熟学科应有的范式规范的。

3. 源于经济人类学范式

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成立初期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曾在云南大学工作30余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的老一代留法民族学家杨堃提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的学科归属问题。他认为:“我所说的经济民族学,也叫经济人类学。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民族学界,受到美国的影响,人类学一名称代替了民族学。但欧洲大陆各国,特别是苏联,还认为人类学仅指体质人类学,故在讲到经济民族学时,他们虽叫经济人类学,却在人类学一名称上加上引号。”“我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他的学科性质是属于经济民族学的”(杨堃,1985)。这是学术界首次有人提出新诞生的民族经济学归属于经济人类学。其后,云南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当时在云南民族学院任教、后调入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工作的陈庆德,对此学科归属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民族经济学是在经济学与人类学的融合中产生的”(陈庆德,1993),“民族经济学是人类学与经济学联姻的直接产物”(陈庆德,1994),“经济学是民族经济研究最初立足的重要场所”(陈庆德和潘春梅,2009)。之后,他的学生们进行了各自的学理性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民族经济学发展的归宿就是经济人类学或经济民族学。

罗康隆和田广(2014)认为:“从19世纪开始,经济人类学主要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以‘原始人类经济’的形态存在为话题,试图检验这样一个原理:世界经济秩序必须以巩固西方工业社会为准则。”他们在论文中引述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民族经济学对于东西部地区差距、不同民族间经济差距、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加速发展战略、西部经济开发、西部人力资源开发、边境开放与边境贸易、西部生态、民族地区城镇化与乡镇经济等问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公认的理论建树,在实践中形成具有创新意识的学科理论体系(李竹青等,1998)。继而得出结论:“我们认为这两门科学在我国学术界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在研究对象和内容方面重叠部分越来越多,而研究方法也有趋同现象,因此我们认为两者的联合似乎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并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以民族经济学为基础,而且只有以民族经济学为基础,才能

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人类学”(罗康隆等,2014)。

郑宇和杨素(2019)认为:“立足于人类学的西方经济人类学也不可能自然而然地演化出经济民族学这一学科。从发展历程来看,虽然人类学传统上注重对边缘群体的调查研究,但其中的少数民族从来都只是边缘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别而已。”“西方经济人类学因此无论在学科起源与当前发展方面,还是在研究对象与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已经展现出与本文讨论的经济民族学的迥异旨趣。”“经济民族学因而是在民族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学科归属定位模糊,西方经济人类学研究对象逐步疏离民族本体以及部分理论预设与研究方法需要反思重构的背景下,倡导从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回归民族学本体,从而系统性、整体性地探索民族与经济相互作用的一门新学科。”这样一种学科归属的学理研究,存在明显的嫁接痕迹,在学理上并不是完全通顺的,在逻辑上也存在瑕疵。

4. 评价

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原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经济学范式,本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所发展,至少也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运用到民族经济学发展之中,能够形成指导民族经济学具体实践的指导思想,并能够使民族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更好地付诸实践,促进生产力发展,取得积极的经济效果。然而,该领域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原意的阐释上,并没有沿着民族经济学路径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甚至也没有指出怎样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成民族经济发展的指南,真正形成民族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范式。代表性论文强调,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考察的是社会现象领域中少数民族经济这一社会经济现象和矛盾,研究少数民族社会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的科学。然而,自此领域的研究开拓以来,至今没有回答少数民族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何种特征,也没有揭示清楚少数民族社会现象领域的特殊现象和矛盾规律。对于民族经济学研究主体的各民族具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怎样按照阶级分野的方式从事经济活动,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这种分析方法只是按照马克思关于民族问题从属于阶级问题的范式,认为阶级剥削消灭了,民族压迫也就自然消解了,这样的理论路径进行了分析,并没有给出各民族拥

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应该采取何种行为,才能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总的看来,这一范式的学科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目前尚难以起到学科发展的引领作用。

由于学科初创时的定义宽泛,导致学科发展的多元化,没有形成一个约定俗成的标准,也就是没有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系的固定范式。关于民族经济学的创立,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了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少数民族发展的低水平问题而建立的,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政策而建立的,还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多元化的要求而建立的,可能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还会有其他的学科发展动因。因此,民族经济学迫切需要确立一种抽象的学科范式,以规范研究者的行为,使学科形成稳定的研究领域与行为,促进学科发展。

学科的研究范围也存在问题,具体是研究我国国内的少数民族经济生活,还是研究我国包括汉族在内所有民族的经济生活,甚至是研究全世界包括所有民族的经济生活,一直没有形成定论,导致学科研究的离散化,并没形成稳定的学科研究领域。在学科研究的目标定位上也缺乏准确的瞄定,有学者认为应研究所有涉及民族经济生活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也有学者认为应研究民族地区的一切涉及经济管理体制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应该研究基于民族内生属性的经济与文化适应性问题。总的来看,就是由于学科缺乏抽象的研究对象所致,学科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的范式抽象。

以经济人类学为来源的民族经济学范式构建更为牵强。研究者起初承认民族经济学的存在,只是认为民族经济学的来源是发展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的“联姻”,强调的只是理论来源与当时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不同而已。后来,其学生们进行发展,认为民族经济学并不存在,或者民族经济学即便存在,也是经济人类学发展的前奏,只是为了经济人类学的成长而临时存在的一个学科,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归宿只能是经济人类学。他们的依据之一,一是国家学位主管部门并不承认民族经济学的存在,即便承认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存在,它也只是隶属民族学的二级学科;二是民族经济学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越来越重叠,这样的两个学科只能合并为一个学科,那就是经济人类学;三是

民族经济学依然没有得到学位主管部门的承认,经济人类学又大大疏离了民族这一主体,为了学科的发展,民族经济学应更名为经济民族学。然而,马克思曾经论述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交往理论,其中包含浓重的民族色彩,而今在资本主义经济还占全球主体地位的发展阶段,还要适应资本主义国际交往的需要,发展民族经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时的民族经济学是十分必要的,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此外,学科的发展来源于人类对某一领域理论的需要,而不是有关政府部门的界定,这也说明,国家学位主管部门需要让民族经济学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以民族作为经济活动和经济利益单元的理论范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指导基于民族维度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发展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范围不断扩大,目前已经单纯地从对民族的认同,发展到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其经济发展指导理论也应该从民族经济学转换为共同体经济学。

三、民族经济学学科称谓及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应关系

民族经济学学科称谓从建立之初就未曾统一过,没有固定的学科名称。1979年3月,全国经济科学八年规划会议上,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提出的名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并被会议接受,列为经济科学的第27个学科;同年9月,在中央民族学院庆祝建国3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提出民族经济学,并于次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建立民族经济学的发端性文章,民族经济学成了最通常的提法;由于民族经济研究难以离开区域的范式,于是主流经济学便把民族经济研究归入区域经济的范畴,也就有了民族地区经济的提法。称谓的不统一给民族经济学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障碍,迄今为止其发展状况仍然如21世纪之初学者所描述的那样:“20多年来,民族学与经济学合演一曲二重奏,但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

析框架和工具,因此未能有说服力地演绎科学理论的逻辑关系。对一些最基本问题的澄清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王文长,2005)。其实,这种学科范式与称谓的不一致,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就是生产力发展变化,必然要求学科的内涵外延与之相统一。

1. 发展早期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混用

在民族经济学科产生之初,施正一、黄万纶两位创始人对学科的称谓一直不同,前者一直称学科为民族经济学,后者则始终称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施正一撰写并主编了《民族经济学概论》等一系列学科教材,黄万纶主编的教材则称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针对这种状况,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于光远两次撰文,强调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有所不同,要深入研究两个概念,以强化民族经济学科的研究工作。1982年于光远就曾指出:我们应不应该使用少数民族经济这个概念呢?我考虑了一个时期,考虑的结果还是能用。大家都知道,在毛主席的书里面曾经用过“少数民族经济”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保留少数民族经济的一个理由,但并不是主要理由。理由是少数民族经济是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不一样的概念。它不是从地区的角度来研究经济而是从一个一个民族的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于光远,1983)。1985年10月,在给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经济专业研究生作报告时他又重申:“今天我讲的是‘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不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现代化。”“事实上这几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研究的比较多,而‘少数民族经济’反而研究的比较少。”“‘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很接近、关系很密切的,但又是不相同的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少数民族经济,指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居民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分配方式、消费方式,中国少数民族居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中国少数民族居民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现状和它的发展等。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指的是这类地区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这类地区的经济发展现状与发展等”(于光远,1987)。

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就是要研究中国56个民族

中每个民族自身文化特点对经济活动过程与效果的不同影响,关注的着力点是每一个具体民族的经济生活;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关注的视角就变成了区域,其可以小于、等于、大于单一民族的居住生活区域,更大的可能是研究涉及几个、几十个民族的生活区域,这样的区域对生产力容纳程度就更大了,发展了的生产力就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这可能也是这一时期民族经济学名称混用的一种解释吧。

从学科创立者的角度来对名称混用进行解释,可能就不是深奥的理论逻辑,而是现实的需要。黄万纶(1983)认为:“少数民族经济这一学科要研究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兼及上层建筑。”“‘少数民族经济’之所以是经济科学中的一个重要学科,这是由其研究对象决定的。因为经济学科的各个学科是从不同角度来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研究社会经济关系(或生产方式)及其发展规律的;而少数民族经济这一学科乃是从民族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的,因而它是属于经济科学的范围,并且具有经济科学的性质。”笔者曾参与黄万纶、李文潮两教授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的编写工作,与黄万纶教授有所接触,但不知为什么他在学科研究对象中提及了少数民族地区,而在进一步的学科定义中并未涉及少数民族地区这一要件,而且学科的称谓一直叫做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在当时的背景下,“在主张‘单一经济学’的我国主流经济学界,仍然对民族经济学心存质疑或偏见,认为经济学的一般学科足以囊括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或方面,不用再去建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学”(庄万禄等,2005),同时也与民族经济学的发展道路有关。“长期以来,民族经济学试图把民族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但又把经济学理解为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具体的经济学理论,这正是始终未能解决民族学与经济学结合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邓艾等,2005)。面对这样的背景和学术环境条件,如果提出民族经济学的称谓,可能让主流经济学界难以接受,如果在定义中加入少数民族地区的因子,又会让学科发展走入已有学科边界,难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如果采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这样专题性研究的名称,是容易被各方接受的。正是因为基于现实考虑的学科界定,也为后来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因为中国少数民

族经济更像专题研究的界定,而不像具有理论意味的学科名称。

2.改革开放成熟期民族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称谓并行

“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经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相比,更抽象简略,包容更广,内容更丰富”(王文长,1999)。换个角度来说,民族经济学称谓更具有学科属性,注重学科内涵和理论抽象,可以为学术共同体的研究工作提供范式参考,是学科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理论铺垫。然而,从学科建立之初,创立者提出民族经济学概念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民族经济学就是区域经济学的声音,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经济学是不存在的,所谓的民族经济学,就是区域经济学的一种特殊切块,就是区域经济学的一种特殊存在。“所以,出现了民族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民族经济学界在自己的圈子内‘自娱自乐’,更多地偏安于西部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全方位研究全国经济发展问题,使得民族经济学很难取得经济学领域的全国‘话语权’,从而没有形成合力,更深入、更具体、更透彻、更全面地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是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滞后所造成的”(庄万禄等,2005)。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是困扰民族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历程也证明了上述说法。在学科概念提出的早期,人们对民族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分野就不甚明了。有学者认为“民族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民族学和经济学的原理、方法,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和规律”(翁乾麟,1987)。还有学者认为“多数同志并不认为,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对象,因而认为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经济(学)仅是同一学科的不同名称。从近几年的研究来看,则基本上是对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是民族地区的各部门经济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对各民族的经济研究实际上被忽视了”(王筑生和杨慧,1984)。说明学科建立的初期,对民族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界线就没有划得十分清晰,影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施正一也认为民族经济“是指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民族居住的特定地区经济,在我国就是指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或民族自治地方的

经济”(施正一,2001)。这随即就引来了质疑声。“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创建30年来,近80%的成果是研究民族自治地方经济问题的。然而,在现实中,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并不等于民族地区经济,更不等于少数民族经济。再者,从在这些成果中去掉‘民族’字样后,从理论到内容,与区域经济学并无二致。出现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具有确切定义的、具有分析意义的核心概念以及概念体系”(包玉山,2010)。有鉴于此,中央民族大学王文长(1999)进行过深入剖析,他认为:“现实的民族经济研究事实上主要侧重于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在学科概念上无论是采取少数民族经济,还是采取民族经济,再具体的理论研究实践过程都是首先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现实的角度切入的。”“都反映了相似的思维逻辑,民族经济研究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此间也有一些理论常识,企图在学科概念和逻辑框架上有所突破”,“当涉及具体的现实经济分析时,所谓的‘民族经济体’又不得不找回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空间形式。这样,新视角实际仍然在谈旧问题。”

其实,学科名称之争还有另外的解释维度,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经济全球化,我们如何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引起了学界的思考。按照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路径进行思考,是不考虑文化与制度因素的,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其发展指导理论是民族经济学还是区域经济学,是没有差异的。然而,中国经济发展并非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完成,我们的发展更加注重文化与制度,我们更加依赖于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总结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可以说,我们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下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这一时期民族经济学的称谓混用,主要是生产力进步而我们没有及时洞察并加以变化的原因。

3.经济全球化演进与民族经济学称谓变迁

在民族经济学定义中引入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概念,这个学术群体主要由施正一教授及其学生组成。有关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王燕祥(1998)认为:民族经济学,目前发展阶段主要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研究。黄健英(2005)则认为:“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大部分侧重于民族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从民族角度或对某一民

族的经济问题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民族经济研究不可能脱离其生产生活的地域空间,而且民族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虽然存在着民族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分离现象,但民族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如何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中民族利益关系还是民族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可以看出,后两位学者对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知各有侧重,但互相并不否定,都认为民族经济学离不开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关于少数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的关系,马丽娟(2003)进行了深入探讨。她认为:“民族经济学是研究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在我国则是研究除汉族以外的各个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当然,“当特定的区域经济以单一的民族构成其活动主体时,区域经济与民族经济完全重合。这种表述是从地域范围表述民族经济的,而不是从民族经济的内禀性质提出民族经济的识别符号。因此,民族经济并不等于区域经济,在现实的情况下,没有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只有纯粹的民族经济模式,民族经济总是和‘其他’经济并行,并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活动特征。”“民族经济的‘区域’概念是这样的:没有一种在地理上、行政上的区域是对民族经济具有识别意义的,民族经济的‘区域’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时空’。”“只有把民族经济同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区别开来,才能为民族经济提供一个合理的和合乎经济现象的领域,才能把民族经济的研究方法、视野、目的和意义引入它自己的位置。”她的研究重点关注了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这一民族经济学发展无法绕过的的问题,具有积极的学术价值,但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这也是一种遗憾。

施正一认为:“从狭义上来说,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我国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它包括的范围也是多方面的,可以把一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也可以把一个民族地区(包括若干个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还可以把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问题作为综合研究的对象”(施正一,2001)。

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反映在民族经济学称谓上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从少数民族经济,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再到区域经济,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甚至学科创始人施正一要研

究若干个少数民族甚至是所有少数民族的经济。这种称谓演变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民族维度的经济研究,但单一民族或数个民族连成的民族地区经济研究,都不足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对结成中华民族的共同体经济进行研究,才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4. 评价

民族经济学研究中的民族经济是具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征的,并不满足西方经济学对于抽象的要求,在空间上又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空间形式,这样一种时空现状,就构成了民族经济学发展的时空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难点问题,学者们便引入了三个概念,以便互相佐证,从而使民族经济学概念更具有科学性和理论价值,但是这确实是以让渡可实施性为代价的。因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特殊切块,而少数民族经济由于经济总量加总困难而不能通约,从而也就影响了抽象性。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就难以走上通衢大道。

民族经济学发展必须解决其与区域经济学的区隔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民族经济学则不能顺利发展。这样一种结果的出现,是与民族经济学建立初期学科名称的不统一大有关系的,也与学科的研究对象不稳定关系密切,更与学科的研究范式没有形成大有干系。由于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大家庭中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学科,不能满足西方经济学最核心的关于经济人抽象,因而不为主流学界所接受。于是为了满足学界同仁对经济学抽象逻辑的偏好,勉强将民族经济学装进了区域经济学的“盒子”,希望它以区域经济学的面貌示人,结果就落进了逻辑不够严谨的圈子,沿此逻辑走下去,后人无力改变民族经济学属于区域经济学的误判。要想让民族经济学实现新发展,就要像施正一(2002)说的那样:“民族经济学研究要有新思路。”

民族经济学要确定一个统一的范式,供学术共同体同仁参考,也为后来加入者提供研究范例。关于范式,托马斯·库恩(2003)认为“‘范式’一词有两种不同意义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做模型和范例,可以取

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而民族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在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发表的民族经济学论著中,很难提炼出共同认可的‘基础理论’,而且同一种‘基础理论’的核心部分也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又重大调整”(邓艾等,2005)。作为已有40余年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学科,迫切需要进行学科范式的统一。

民族经济学的出路就在于共同体经济学。中华民族是一个与西方民族完全不同的民族,西方的民族过程是一个充满压迫的过程,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剥削和强权;中华民族则不一样,我们的民族过程是和平的过程,是通过经济交往而实现文化认同,最终组成一个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叫做中华民族共同体,它是靠对于共同体的意识认同而铸牢在一起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起着重要作用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共同体经济学。

四、时代呼唤共同体经济学

《辞海》中对共同体的解释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则是:“中国各民族的总称。”无论从哪个层面进行解析,中华民族共同体都是对中国56个民族的集结与整合,都体现为中华民族认同范围的扩大与认同程度的提高,都是中华民族由多元走向一体的重要体现。世界上有多个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其中独特的一个。就像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表的《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特别致辞指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习近平,2021)。人类文明存在着新形态,我们理解为中国形态。对于这种形态的独特性,历史学家许倬云进行过阐释,他认为:“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这个个案,确实是相当特殊。欧洲有过希腊、罗马、教廷这几个大型的共同体,中东也有过伊斯兰的共同体,南亚有过印度共同体。但是,中国这个共同体,其延续之长久,而且一直有一个相当坚实的核心,在同一个地区继长增高,其内容却不断地改变,不断地调适;凡此,都是与上述另外几个共同体不能同日而语的。”“维系‘中国’这观念的真正力量,可能是经济。经过长期构建的市场交换网,使得各地的物资有无相通,也互相依赖”(许倬云,2015)。西方的共同体及其文

化,是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西方人“他们可能扩大他们的国家,却不能扩大他们的民族。即如英国只有三个岛,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他们的大英帝国几乎可以控制全世界,但始终不能把自身三岛融合为一。这是什么道理呢?从他们根源上探讨,还是文化问题。我们认为西方文化可以使他们的民族向外伸展,却不能使他们的民族向内融凝。中国文化伟大之处正在这上面。在孔子以前,中国人创造了中国文化。孔子以后,中国文化则又再创造了中国人”(钱穆,2019)。可以说,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经济活动,中华民族的形成就是经济居先而后文化一体的(李曦辉,2018)。我们研究共同体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研究经济发展模式对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作用。

自古以来,对生产力进步与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就是分工、规模范围效益以及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演进,对经济发展要素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强化了分工。《国富论》的开篇就讲到:“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亚当·斯密,2010)。有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演进过程中的分工深化进行过归纳总结,认为:“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使中国的民族与经济区域分为南北三个发展带和东西两大部。即秦岭——淮河以南是水田农耕民族和水田农业发展带;此线以北到秦长城以内(包括辽东、辽西)为旱地农耕民族与旱地农业发展带;秦长城以外为游牧民族与狩猎民族发展带。这三带天然划分又天然互相依赖互相补充。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曾开凿过中国南北大运河那样的运河,也不曾像中国那样在古代发展农牧业及农业各区域之间的商品交换”(陈连开,1989)。可以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我国经济分工不断深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第二,强化了规模范围效益。阿尔弗雷德·钱德勒(2006)对规模和范围给出了定义:“规模经济界定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范围经济为(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许倬云(2015)认为:

“在空间的平面上,中国的各个部分,由若干中心地区,放射为树枝形的连线,树枝的枝柯,又因接触日益频繁,编织成一个有纲有目的网络体系,几个地区的网络体系,逐渐因为体系的扩大,终于连接重叠,成为更庞大的体系。”这种网络体系的形成,是以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为前提的,只有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才有经济的规模范围不断扩展。第三,强化了创新。郭武军、吕阳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文版序言中对创新进行了描述:所谓创新,就是迫使经济体系改弦易辙,朝着企业家设定的方向前进。这是利润的终极来源,利息、经济周期等现象,都只不过是这个本源现象的衍生品,利息只是企业家创新引发扰动向循环之流是渗透的结果,经济周期是经济体系对这种扰动的适应和吸收(熊彼特,2015)。由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不断壮大,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虽然修建了长城,但是其防御作用日渐弱化,在农牧互补关系形成以后,就成了一道壮丽的景观。为了沟通南方经济中心区、京畿政治核心区和北方游牧区,我们的先辈开发了京杭大运河,这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创新。后来的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可能是受到了我们的启发才得以开挖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创新进程。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壮大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华民族经济发展也在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完善。首先,分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壮大。许倬云(2006)在论及明清经济政治关系时认为:“中国内部没有分裂为若干独立国,其缘故一则在文化凝聚力,一则在全国性经济交换网络继续扩展,不断将全国吸入一个整合的经济结构。”可以说,分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规模范围效益支撑中国化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许倬云(2006)在论及中国经济的规模范围时提出:“以清代为例。核心区是政治大脑的京畿与经济心脏的江南,由运河一线沟通联系。边陲区是沿边各省,而中间区是内地各省。论经济水平,江南不仅有高度农业,也有市民经济的工商业。京畿则由江南哺养,京津一带也有高度经济发展。”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区之间是先有经济联系,然后才形成逐渐紧密的联系,直至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其次,创新将中华民族融为一体。中国科学院学者总结了人类文明社会以来中华民族对

人类做出的85个重要贡献,其中就有公元前三世纪李冰父子创造的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在该枢纽工程建立之前,成都平原是经常发生洪涝灾害的,为了自保,在洪涝灾害发生时,各区域经常向其他区域泄洪,导致不同地域间的关系紧张。自从枢纽工程建成后,成都平原各区域都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不同地区要紧密协调,才能得到好的收成。久而久之,区域就结成了紧密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由一个个这样的小的共同体凝聚而成的,创新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黑龙江时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认为这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型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这种生产力核心内涵的变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影响。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要求突破的主体——人具有优良的创新基因,才能完成革命性的创新人物。农耕民族因为不能像游牧、商业民族那样去抢夺草场和占领殖民地开拓市场,因而只能眼睛向内去创新生产要素,其创新基因是历史形成的。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就要求我国各民族紧密结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继承各自优秀的基因、特别是其中农耕民族创新基因,才能实现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目标。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也就越发结成紧密的民族共同体。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要解决配置规模范围和配置效率问题,其核心是配置规模范围问题,这必然带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断扩大。产业转型升级,这主要是需求升级推动的,而需求升级,又是需求主体的革命性变革引致的,这些都源于中华民族不断融合造成的中华文化变迁,可以说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中华民族文化的升华,其背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不断壮大和优化。

分工、规模范围、创新,都需要生产要素配置的时空范围不断扩大,只有这样才能达成目标。民族共同体是目前人类所能达到的认同范围的最大化概念,基于人的属性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目前还不具备实现人类大同的条件,还需要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落到经济学理论上,主要由区域经济学来描绘这类人类经济实践,因为民族共同体的经

济效益是区域经济学框架体系内目前可以达到的最大规模范围,是区域经济学追求目标的最优化体现。一旦超出民族共同体范围,民族文化就不能涵盖,就会导致不同经济主体间文化的矛盾,就会导致经济活动中产生摩擦,导致效率的下降,所以说这种经济活动是区域经济学目前容纳区域的极限,从这点来说,共同体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学理基础是互相贯通的。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2014年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30.
-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习近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3-10-29.
- [4]张胥.马克思恩格斯民族理论及当代价值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 [5]列宁.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6]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 [8]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0]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13]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14]贾晔.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管见[J].广西民族研究,1992(1).
- [15]杨堃.论拉法格对民族学与经济民族学的贡献[J].思想战线,1985(1).
- [16]翁乾麟.理论与实际: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试探[J].青海社会科学,1987(6).
- [17]黄万纶.论“少数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 [18]刘永佶.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7(5).

- [19]沈斌华.劳动者的民族经济学:读刘永信主编的“民族经济学大纲”[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2).
- [20]沈道权.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2).
- [21]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中共中央文件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 [22]龙远蔚.少数民族经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民族研究,1998(5).
- [23]叶坦.全球化、民族性与新的发展观:立足于民族经济学的学理思考[J].民族研究,2005(04).
- [24]施正一.民族经济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 [25]费孝通,林耀华.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载于林耀华.民族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26]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3).
- [27]施正一.关于发展我国民族经济学的几个问题[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 [28]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导师组.民族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9(2).
- [29]陈庆德.民族经济学的理论发展[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1).
- [30]陈庆德.民族经济学构建的历史使命[J].云南社会科学,1994(3).
- [31]陈庆德,潘春梅.民族经济研究的理论渊源[J].民族研究,2009(5).
- [32]罗康隆,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4(3).
- [33]李竹青,那日.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 [34]郑宇,杨素.经济民族学学科构建刍议[J].西北民族研究,2019(3).
- [35]王文长.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J].民族研究,2005(4).
- [36]于光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 [37]于光远.少数民族经济的现代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 [38]庄万禄,陈敏,马秀琴.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5).
- [39]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2).
- [40]王文长.关于民族经济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1999(4).
- [41]王筑生,杨慧.关于民族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6).
- [42]施正一.民族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 [43]包玉山.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核心概念、概念体系及理论意义[J].民族研究,2010(5).
- [44]王燕祥.经济人类学与民族经济学[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3).
- [45]黄健英.民族经济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5(6).

The Exploration of Cre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to a Discipline——from National Economics to Community Economics

Li Xihui

Abstract: The issue of national economy is a concept often mentioned by classical writers such as Marx and Engels in their works. The issue of nationality is also an important issue of concern to revolutionary mentors, but most of the nationalities they pay attention to belong to the level of nation-states. Marxist theory holds that human beings have always had community identity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ivilized society. In the period of low productivity development, people identify with a smaller blood community. After a certain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people began to identify with a relatively large-scale geopolitical community; afte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people began to identify with a larger cultural community, that is, the national community; when productivity is highly developed, human beings will achieve great harmony. National economics is an economic theory born in China. It originated in the 1920s and was formally born in 1979. Adapting to the level of productivity at that time, it was mainly to stud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coupled with the fact that human societ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thnic economics has also entered a new paradigm era with the times. It urgently needs to evolve into community economics and play a role in creat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Economics; Community Economics; Discipline Development; New Paradigm

(责任编辑:平 萍)